

收稿日期:2025-01-08

战争之深殇、人物之独特与意蕴之丰富

——论海饶《我的弗兰茨》

古大勇¹, 蔡莉²

(1. 绍兴文理学院 鲁迅人文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2. 绍兴文理学院 图书馆, 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 华人作家海饶近期出版的《我的弗兰茨》, 是一部深度表现二战题材的小说。该小说对二战记忆进行了及时性抢救, 揭示了战争创伤的代际性、持续性和延宕性, 表达了批判战争、呼唤和平的主题, 同时对二战进行了深层反思。另外, 小说塑造了文学史上罕见、具有丰富性格内涵与审美价值的白格夫人形象, 构建了一个“人性(文化)—社会(历史)—形而上思考”等多重主题意蕴组合的复合型文本。

关键词: 海饶; 《我的弗兰茨》; 战争书写; 人物塑造; 多重主题意蕴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873(2025)03-0108-08

基金项目: 2024—2026年度中国侨联课题(一般项目)“新移民作家创作与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暨文明互鉴研究(1990—2024年)”(24BZQK208)。

作者简介: 古大勇(1973—), 男, 安徽无为市人, 绍兴文理学院鲁迅人文学院教授, 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蔡莉(1980—), 女, 安徽宿州市人, 绍兴文理学院图书馆馆员, 学士,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DOI: 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5.03.038

德籍华裔作家海饶女士是近年来海外华文文坛上一位取得卓著创作成就的作家, 曾出版过《远嫁》《早安, 重庆》《台湾情人》等长篇小说, 以及部分中短篇小说。最近, 海饶创作的20余万字长篇小说《我的弗兰茨》在《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23年第3期发表, 小说的单行本也旋即于2023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总体上来看, 这是一部深度表现二战题材的小说, 同时, 小说在富有人性内涵和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塑造, 中西跨文化比较书写, 真相与假象之关系、爱与宽恕等形而上思考, 以及富有想象力的语言表达等方面, 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

一、深刻的战争创伤书写与二战反思

小说通过两位移居德国的重庆外嫁女夏一红和吴嘉陵的视角, 深入描绘德国家庭生活, 再现弗兰茨家族和大熊家族几代人在战争中的悲剧性命运, 展现了战争给德国人民带来的难以治愈的伤痛, 揭示了战争创伤的传递性、延宕性、代际性, 建构了几代人对战争创伤的集体记忆, 用文字的形式对二战记忆进行抢救, 同时也表达了对战争的深度反思。在二战中, 犹太民族遭到了以

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人的大屠杀,同样,普通德国人民一样也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无数家庭分崩离析,亲人之间生离死别。在两个男主角的家族中,几乎所有男性成员都在那场战争中受到伤害,或丧身,或失踪,或严重受伤而留下终身残疾,而家族中的女性,或受到精神刺激,患上老年痴呆症,或发生精神错乱,把儿子视为亡夫,发生令人不齿的乱伦关系。小说描写了德国人民在战争年代承受的牺牲、伤亡和痛苦,还着力表现在和平年代他们承受的痛苦,战争创伤被完整传递到后代的身上,战争引发的创伤疼痛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痊愈或缓解,“战争留下的阴霾和伤痛,一直在这个民族的心灵深处盘踞着,就像一条毒蛇,随时会醒来……只要他/她是德国人,心里都盘踞着这条毒蛇,时不时会被咬上一口,疼痛难忍,欲哭无泪,要么一命呜呼,要么舔舐着带血的伤口苦度余生,要么向身边的无辜者喷吐出毒液。”^[1] 大熊无法从父亲参加“党卫军”的阴影中走出来,父亲的不光彩经历令他产生羞耻感和自我认同的危机,19岁时他去医院做了绝育手术,通过阉割身体来进行创伤疗愈。弗兰茨在与母亲乱伦关系的纠缠中,不堪心灵重负,残忍地将利刃挥向无辜的妻子。大熊和弗兰茨躲过了残酷的战争,却无法躲过更具杀伤力的战争“余震”。小说深刻地表现了战争对德国人民带来的巨大创伤及这种创伤的持久性特征,弗兰茨母亲白格夫人,其实可以被视为被战争摧残、无法痊愈的一代德国人的象征,表面上看起来亮丽健康、风采迷人,但内心千疮百孔,伤痕累累,不堪重负。

小说还通过对弗兰茨、大熊两个家族中不同成员遭遇的书写,建构起关于二战创伤的“集体记忆”。哈布瓦赫在其《集体记忆》一书中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他认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也不是某种神秘的群体思想,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个体通过把自己置于群体的位置来进行回忆,但也可以确信,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这些植根在特定群体情境中的个体,也是利用这个情境去记忆或再现过去的。……每一个集体记忆,都需要得到在时空被界定的群体的支持”^[2]。在小说中,无论是战死疆场的弗兰茨的爷爷和大熊的舅舅、失踪不明的弗兰茨的父亲和大熊的爷爷、幸运活着回来的大熊的父亲,还是因受到刺激而精神错乱的弗兰茨的母亲和奶奶,抑或是活在愧疚和压抑之中的弗兰茨和大熊,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个关于战争的个体创伤记忆,这些记忆共同组建了那段独特的“集体记忆”。评论家陈瑞琳说:“那些嫁到德国的中国女子,其实是嫁给了那段无法言说的历史。”^[3] 小说中两位中国女主人公,因为都嫁给了德国男人,皆身不由己地被卷入那个本与她们无关的战争梦魇中,而夏一红甚至以自身的死亡成为这场战争的“献祭品”。

记忆的目的在于不被遗忘,通过记忆唤醒良知和责任。保罗·利科将自然记忆分为:病理学-治疗学层次“被压抑的记忆”、实践层次“被操控的记忆”、伦理-政治层次“有义务的记忆”。所谓“有义务的记忆”,就是“记忆的责任”,即“我们确实不能撇开历史的条件不谈。在历史的条件中,诸如,在20世纪中叶那些可怕的历史事件之后的几十年间,在西欧,尤其在法国,记忆的责任是必要的。只有当民族共同体,或者政治集团中受伤的那部分感到有困难心平气和地记住这些事件时,命令才获得其意义”^[4]。就战争的“集体记忆”而言,“记忆的责任”要求我们对战争进行忏悔和反思,思考人类如何走出伤痛,让战争不再发生、历史的悲剧不再上演。

小说也有意识地触及对二战的忏悔与反思,担负起“记忆的责任”。大熊父亲的身份是党卫军,党卫军长期受纳粹主义毒害,战争中杀人如麻,凶残无情,在历史上臭名昭著。然而,生活中大熊的父亲,善良慈悲,善待生命,热爱小动物,甚至为它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日常表现与凶残冷酷的党卫军作风完全两样。当吴嘉陵问大熊其父亲在战争中是否杀过人,大熊说:“(他)走路连蚂蚁都不忍心踩死,怎么会杀人!可战争就是杀人的机器!机器一旦转动起来,每一个士兵都是杀人凶手!”^[1]

按照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人往往是善恶二极对立组合的统一体,一些战犯并非天生就

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他们身上也存有善的成分。那么,小说中大熊的父亲,一个平时连蚂蚁都不忍踩死的善良之人,为何又在战争之中成为杀人凶手呢?大熊给出的理由是战争机器的推动,确实不无道理。一个渺小的个体一旦被卷入到战争这个庞大的系统之中,就如高速运转机器上的一个单只齿轮,只能顺从于机器的运转而失去了自身动弹的能力,当面对权威的上级下达命令时,他们无可选择。汉娜·阿伦特在二战甲级战犯艾希曼身上发掘出“恶的平庸”特点,他“既不阴险奸刁,也不凶横而且也不是像理查德三世那样决心‘摆出一种恶人的相道来’……恐怕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外,没有其他任何的动机”^[5]。他认为服从上级的命令是理所应当的,甚至为自己服从命令和出色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而感到骄傲,但他却不会思考这样做是否合情合理,自身缺乏理性和判断力。虽然小说没有明确交代大熊的父亲何以参加党卫军,然而在时代大潮流的裹挟下,他身上难免具有的“恶的平庸”特点,促使他将服从视为天职,从而不自觉中成为战争的帮凶。

对包括大熊父亲在内的普通人而言,“平庸”之“恶”还体现在他们具有“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赖希认为,人的性格结构是复杂的,由三个层面组合而成,其中第二层是人的原始生物欲望的派生物,表现为残忍、嫉妒、贪婪、虐待狂、好色等,而这正构成了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内核。法西斯主义是普通人性格结构有组织的外在政治表现,因此,包括大熊父亲在内的很多人身上或许都具有法西斯主义的情感因子,“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是‘小人’的精神,小人被奴役,渴望权威,同时又喜欢造反”^{[6]5}。法西斯政治运动,不仅是独裁者的个人行为,而且也有群众的参与、拥护和推波助澜,单凭独裁者的个人力量是无法最终完成的。正如赖希所说:“只有当元首的个性同广大集团的结构相合拍时,‘元首’才能创造历史。”^{[6]31}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大熊的父亲保存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包括大熊父亲在内的几个士兵并肩行纳粹礼,照片背后写着一串阿拉伯数字,数字内容则是希特勒的生日,或许他们是在以庆生向元首表忠心,他们原来是把希特勒当英雄来崇拜的。因此,大熊父亲参与那场历史灾难事件中,原因在于其性格结构中沉睡的法西斯主义“小人精神”在战争大背景下被唤醒点燃,他与他们的元首、与全民性的法西斯运动形成同频共振与合谋关系,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

1972年,德国勃兰特总理在波兰华沙犹太烈士墓前下跪表达忏悔这一行为,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谅解和尊重。小说也描写了德国人对战争忏悔的表现,大熊的父亲对鱼和鸟为何表现出格外的关爱,是因为“他把它们当作曾经倒在他枪口下的逝者的亡灵,想以此获得灵魂的救赎”。希特勒家族的一位后人,用自我阉割的方式来终结这个有罪的姓氏,以此替家族向世人谢罪。年轻的大熊也通过同样的自我阉割方式来表达忏悔与谢罪。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国反思二战的过程中,出现了“集体罪责”这一概念,托马斯·曼在一次演讲中说:“德意志民族应该为纳粹的当权和发起的战争承担责任,虽然这很痛苦,但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7]整个德意志民族和德国人都应该为那场战争负起责任,大熊的“自我阉割”行为,看起来匪夷所思,但其实就是他自觉承担二战“集体罪责”的具体表现,不但是在替父亲和家族谢罪,而且认为自己也有罪,从而与这个民族共同承担罪责。小说中的“我”(吴嘉陵)不理解德国人这种严苛的、近乎“自虐式”式的忏悔:“上一辈人造的孽,为什么要下一辈人来承担恶果?德国人对战争的负疚,忏悔,承受的痛苦,何时才能有个头?”^[1]德国人“自虐式”忏悔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基督教“罪文化”的影响。德国人主要信仰基督教、福音新教、罗马天主教,原罪—认罪—赎罪的核心教义深深植入到每个基督徒的心灵之中,而新教教义则严格要求信徒对自己所犯罪过予以“清算”,德国《基本法》序言中更突出“对上帝的负责”的精神。这种以忏悔意识为特征的基督教文化,成为战后德国勇于反思和承担罪责的精神基础^[8]。

二、独特的人物形象塑造

为什么读者读过小说之后,会对白格夫人念念不忘?这恐怕与这个人物形象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有关,可以说,白格夫人这一形象堪称是中外文学史上罕见的人物形象。白格夫人在小说中出场时已经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可是她高贵典雅,光彩照人,纵然是美人迟暮,但气场依旧,令周围人黯然失色。二战时期,她深爱的恋人弗兰茨上东线战场参加战争,圣诞期间回来短暂度假,她偶然间怀孕,弗兰茨假期结束后匆匆奔赴战场。战争结束,他却没有回来,白格夫人痴痴等待,年复一年,爱人仍然不归。她甚至为了怀念她的丈夫弗兰茨,将她儿子、孙子的名字都命名为弗兰茨,想让丈夫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正是在这样一种极度思念的情况下,白格夫人产生了精神错乱,她将儿子弗兰茨视为丈夫的化身,每周需要儿子来陪一次同床共眠,从而发生了令人难以接受的乱伦事件。

乱伦行为曾经是人类文明进化过程中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人类童年经历了漫长的血缘婚时期,基于血缘婚性质的性体验和心理经验的反复出现,经过时间的漫长沉淀,最终形成了一种普遍存在的集体无意识——“乱伦情结”。但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基于社会伦理的要求,禁止具有血缘的亲人之间发生性关系,从而产生“乱伦禁忌”的原则。为了强化这一原则,人类不但从法律法规层面制定了触犯“乱伦禁忌”原则的各种严厉惩罚措施,更在文化心理等意识形态层面来强化这一价值认同。在中国,传统宗法文化的核心之一是血缘化伦理和血缘情感主义,“而乱伦原意为扰乱伦理常规,这里尤指扰乱宗法制家族内部的亲疏有序、男女有别的伦理关系,这当然是血缘化情感、血缘化伦理之大忌,也是中国存在着最苛严的乱伦禁忌的根本原因”^[9]。因此,在人类文明社会中,一个人如果产生乱伦行为,往往被人们所不齿,严重者会受到最高是死刑的各种惩罚。

文学领域里有两种理想,一种是道德理想,一种是审美理想。相应地,评价或审判文学价值也有两个法庭,一个是道德法庭,一个是审美法庭。道德理想和审美理想体现出不同的价值观念,按照道德理想的要求,在文学艺术中,如果一个人物被塑造成毫无道德瑕疵的“完人”,就具有最高的价值。而审美理想则不然,它的评判标准是人物内涵塑造的生动性、形象性、丰富性与复杂性。一个道德水准不高的人物,也可能具备较高的审美价值。将白格夫人置于“道德法庭”的审判下,触犯“乱伦禁忌”原则的白格夫人必然是罪孽重重、不可饶恕的“罪人”,不具备什么道德价值。但如果把她押解到“审美法庭”的大厅下,她的“罪人”身份瞬间发生变化,变成“审判官”眼中风情万种的“美人”。在“审美法庭”的判词中,她是一个承载着丰富人性内涵与文化内涵的“圆形”人物形象。白格夫人平常以天使般完美的形象出现。例如,在她儿子弗兰茨和儿媳夏一红的婚礼现场,“整个人显得光彩照人……像一尊古希腊女神像,美得遥远……让周围的一切都黯然失色”^[1]。然而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写白格夫人带“我”去参观她的房间,白格夫人表现得热情而又彬彬有礼,不失完美风度。但是仅仅因为“我”说了一句话就彻底冒犯了她,她瞬间变成了“魔鬼”。为何有如此变化?直到小说的后半部分才知道,原来是“我”的一句问话深深触痛了白格夫人——房间里那张床,不是为了迎接随时归来的丈夫,而是她和儿子每周一次的乱伦场所。羞辱、不安、罪感、自尊的伤害、被揭伤疤的痛楚等一起瞬间涌起聚集,疯狂冲决了白格夫人脆弱的理性堤防,情绪如排山倒海之势爆发出来。一方面,她要在儿子身上满足她对亡夫极度思念的欲望,另一方面,她又摆脱不了由这种畸形关系所带来的原罪感和耻辱感,乱伦欲望与乱伦禁忌奇妙地结合在她的身上,成为她终身挥之不去、如影随形的梦魇。另外,她身上还表现出多重的矛盾组合。一方面,她遗世独立,高傲清冷,高不可攀;另一方面,她又“生动又俏皮,可爱极了”^[1]。一方面,她精于修饰保养,打扮时髦新潮;另一方面,她又怀着浓厚的传统怀旧心理,不舍得扔掉

儿子弗兰茨小时候穿的旧衣服,不顾儿媳的反对,执意让孙子天赐穿。她住的房间面向阴森的坟墓,寡居的生活一成不变,刻板如死水,看起来缺乏活气。然而她的内心却充满浪漫诗意,她的日记中写有许多才情横溢的情诗。

鲁迅先生在他的有关《红楼梦》等古代小说的论述及部分杂文中,多次论述文艺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美学原则,即人物塑造的“美恶并举”“美丑泯灭”原则。刘再复提出了“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10],指出了人物性格善与恶、美与丑、悲剧与喜剧等二重组合的特征,这些正负两极的特征共同组成一个个内涵丰富、熠熠生辉的人物典型。在白格夫人身上,完美与缺陷,天使与魔鬼,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与乱伦性质的出轨,行为举止上的高贵与母子乱伦的卑俗,外表的冷傲与内心的狂热,情感状态的正常与错乱,这些性格组合的因子都得以生动地体现。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文学批评方法,和传统的道德批评不同,“它不是从今天的道德立场简单地对历史的文学进行好与坏的道德价值判断,而是强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并从历史的角度作出道德评价”^[11]。同样,对《我的弗兰茨》中的乱伦行为,我们也不必以今天的道德立场来进行裁判,而是要回到二战时期那个特定的德国历史语境中。笔者在研究中外文学史上一些表现后母/继子这一乱伦模式的小说时发现,在这些作品中,作家普遍对其笔下的乱伦主角“后母”乃至“继子”充满同情宽容而不是指责批判,原因是“她们承载着对父权文化的批判与表现人性解放的双重道德任务,表现了自觉的‘渎父’或精神‘弑父’的主题”^[9]。也就是说,只有把小说中的乱伦行为放置到父权文化占据统治地位的特定时代背景下,才可能更好地理解这些乱伦行为并予以理性评价。而要理解《我的弗兰茨》中的乱伦行为,就必须具备类似的历史主义眼光,把这桩乱伦事件置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中。白格夫人不是天生变态,是战争令白格夫人思夫成疾,精神发生错乱,将弗兰茨当成自己的丈夫。如果了解了这一背景,我们就会意识到引发这一乱伦事件的元凶其实是二战,从而把批判的矛头转向残酷的战争,而对白格夫人予以更多的同情和宽恕。

白格夫人与弗兰茨的乱伦叙事内容触及古希腊神话母题。在古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命中注定必然杀死自己的父亲,娶自己的母亲为妻。他犯下弑父娶母的大罪,还和母亲生育了两个孩子,可他自己对此却毫不知情。俄狄浦斯知道真相后刺瞎自己双眼,自我放逐,以求忏悔。古希腊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剧本《俄狄浦斯王》,即取材于此。弗洛伊德认为这个情节反映了男孩爱母憎父的本能愿望,他将之称为“俄狄浦斯情结”。人的这种本能愿望是从原始人的心理中继承下来的,无法抗拒,它存在于人类的无意识领域,持续活动,致使人产生悔罪之感,由此被弗洛伊德视之为宗教和道德的起因。而小说中弗兰茨对母亲白格夫人的畸形之爱,显然其中也有人类无意识领域中“俄狄浦斯情结”的投射。

三、多重主题意蕴的组合

有学者在研究鲁迅文学时,认为鲁迅的文学世界存在一个纵贯“人性(国民性)—社会(历史)—哲学”的三重意义体系,从而推断人类文学中的伟大之作也多会携有“人性(国民性)—社会(历史)—哲学”的三重意义谱系^[12]。质言之,优秀作品的内涵从来不是单一的,而是有多重意义内涵的。《我的弗兰茨》也是如此,小说除了再现战争创伤、抢救二战记忆,以及对战争深层反思之外,还有其他多维的主题内涵,如自觉的中西文化之比较,对真相与假象之间辩证关系的形而上思考,表达悲悯、宽恕与爱的主题,意图通过这些构建一个具有“人性(文化)—社会(历史)—形而上思考”等多重主题意蕴组合的复合型文本。

海烧出生和成长于重庆,在中国接受过高等教育,对中国文化耳濡目染,后移居德国并生活多年,对德国文化也熟稔于心。这种中西双重生活经历赋予她跨文化的视野,小说有意识地通过

各种细节描写来凸显中德文化的差异。如当夏一红发现弗兰茨与其母亲之间关系的真相后,企图离开弗兰茨,偷带儿子回国,不料在机场被拦,情急之下向机场警察下跪,求饶放行。有读者认为这个细节有损中国人的形象,但是,这个细节恰恰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也符合人物的文化身份。夏一红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其思想必然打上中国文化的烙印,而“下跪文化”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内容。在那样一种紧急状态下,几乎容不得夏一红多考虑,一种想要“过关”而救出自己和儿子的本能驱动促使她做出下跪的举动。但是,两个警察却不为所动,坚持按照规定办事,不让他们通过。吴嘉陵和丈夫大熊吵架,企图用哭闹的方式让大熊让步,但最后她终于意识到:“面对德国男人,中国女人的撒娇耍横,一哭二闹三上吊,不是索爱求怜,而是神经病发作。”^[1]中国文化讲究合情,情先于理,合理还必须合情,所以有时候做事不讲原则。西方文化讲究合理,合理压倒合情,不和稀泥与妥协,坚持原则。韦伯所讲的责任伦理,即只看效果,不看动机,只强调合理合责任,不注重合情合心性。

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典型地表现了中国人和德国人对宗教信仰理解的差异。夏一红想加入基督教,神父问夏一红信不信佛,夏一红说她遇见庙宇就去烧香,遇见教堂就去祈祷,而神父告诉她不能入教,因为基督教只承认一个神。这里体现中国和西方宗教信仰的差别。中国很多庙宇虽然香火旺盛,信徒众多,但信徒求神拜佛的真正目的大多是求子、求财、求官、保平安等现实功利性目的,而非真正理解宗教的精神,也非发自内心的精神需要,更谈不上虔诚地皈依宗教。鲁迅曾提出“吃教”的概念^[18],既然“教”可以成为“吃”的对象,那么,只要有用,都可以拿来“吃”,所以夏一红无论遇到的是庙宇还是教堂,都要去参拜或祈祷一下。鲁迅认为中国人“无信仰”,大概就是从这个层面来说的。而西方人认为,上帝(耶稣)是他们唯一承认的“神”,具有信仰的排他性。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神父拒绝夏一红加入基督教的原因。

文中其他细节还有:对夏一红重视的“坐月子”,弗兰茨和其母亲都不以为意,并不重视;大熊说妻子吴嘉陵砍价太狠,没有诚心,吴嘉陵却觉得德国人不懂讨价还价之乐;吴嘉陵的朋友乱丢垃圾,大熊认为此举不文明,当众将垃圾捡起来,让朋友感到很没面子;夏一红打电话给吴嘉陵,吴嘉陵不接,而是让大熊帮忙撒谎说她已经睡了,大熊却认为吴嘉陵撒谎不诚实,坚决不配合。小说中的吴嘉陵对中国人和德国人的思维作了一个比较:“这就是典型的德国人呀,脑子基本不会转弯,用我们重庆话说,就是‘方脑壳’。他们哪有我们中国人聪明,心眼多,又灵活,七弯八拐,随便一绕,就把他们给绕晕了,东南西北都找不着了。要论耍心眼,玩计谋,德国人哪是我们的对手?”^[1]诸如以上中西文化比较的细节在小说中俯拾皆是。小说是一部生动形象的跨文化性质的文学文本,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小说还表达了对真相与假象之间关系的形而上思考。生活有两种面貌,一种是真相,一种是假象,很多时候是假象覆盖了真相,真相以假象的面貌呈现出来,从而体现了世界的荒诞。但更为荒诞的是,当生活以假象呈现的时候,给人们带来的是安宁、和谐甚至是幸福,而当假象被撕破、真相显露的时候,给人们带来的却是毁灭性打击和彻底的虚无。于是,我们就陷入了悖论:是维持假象还是揭露真相?钱钟书的《纪念》和海饶的《我的弗兰茨》就分别书写了两种可能性。《纪念》写的是一个发生在抗战期间重庆的故事。主人公曼倩和才叔自由恋爱结婚,后来曼倩出轨她丈夫的表弟天健,曼倩因此怀孕,而才叔并不知情。在一次空战中,作为飞行员的天健牺牲。蒙在鼓里的才叔为了纪念天健,决定将妻子肚子里的孩子命名为“天健”,曼倩虽然反感,但也说不出什么理由来反对。作品中的才叔生活在假象(婚姻忠贞)之中,他对天健的真诚感情,是建立在生活假象基础上,而这种生活假象却占据了支配地位,而真相(妻子出轨)却永远处于秘密状态,无法进入生活。虽然是假象,但却可以决定曼倩和才叔后半生命运——风平浪静的安宁一生。倘若真相浮出,那么他们婚姻的小舟就可能“船毁人亡”,甚至还会累及无辜的小天健。因

此,假象虽然荒诞,但对曼倩和才叔来说却是最好的人生选项。《我的弗兰茨》表现的就是假象被撕破、真相被呈现后,人物命运的翻转。当真相(母子乱伦)被覆盖、假象(夫妻恩爱)被呈现时,夏一红是一个无比幸福的女人,而当真相(母子乱伦)被呈现、假象(夫妻恩爱)被撕破的时候,夏一红的幸福世界如雪山般坍塌了。在《纪念》中,人生真相与假象构成对照,人生假象覆盖了真相,从而揭示了人生的荒谬和尴尬,构成对人生的讽刺。《我的弗兰茨》中,一开始也是假象,但后来真相逐渐覆盖假象,真相摧毁了所有现存秩序。在作者看来,也许对夏一红而言,《纪念》中的那种“假象”生活状态才是其最好的选择。但明知“假象”之荒诞,而又不得已选择“假象”,多少表现出鲁迅所谓“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14]的特征,但客观上来说,这又是趋利避害的行为,能破解人的生存困境,这其间存在的悖论更体现了人生的荒诞本质。

由此看来,这两部小说都触及现代派文学中常见的“荒诞”主题。在现代派看来,荒诞是人与世界、人与自己关系的本质特征,荒诞体现的是一种不真实的分裂状态,传统理性与非理性之间产生了不协调感、滑稽感,也就是荒诞。以“荒诞”为主要特征之一的现代派文学的产生有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即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这些造成了传统价值观的坍塌,使世界失去了理性和秩序,成为非理性的荒诞存在,人们陷入到一个没有价值依托、无所适从的尴尬境地。在《纪念》和《我的弗兰茨》中,“假象”就是非理性的存在,而它却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终身遮蔽着“真相”的出现,人们不得不依靠“假象”来维持世界的秩序,获得个体的价值,不是真相而是假象成为人与世界之间的链接,因而现代主义的荒诞感扑面而来。

《我的弗兰茨》充满悲悯情怀,表达了宽恕与爱的主题。作者对自己笔下的所有人物,都有一种温润的爱,即使是对陷入乱伦关系的白格夫人和弗兰茨,也表达了同情和悲悯。对这一乱伦事件,夏一红无法原谅,而吴嘉陵的态度和她相反,曾多次劝她“用理解、同情和宽容,去帮助和拯救身边的爱人,同时也帮助和拯救自己”^[1]。吴嘉陵对发生自己身上的一桩由假象变成真相的事件,采取的同样是宽恕态度。她偶然间得知大熊在19岁时就进行了“自我阉割”,然后长久隐瞒真相,剥夺了她做母亲的权利。后来,她了解了这一事情的原委:大熊父亲参加党卫军的经历成为他一生的“污点”,从小学到大学到服兵役他都受到歧视欺负。后来谈了一个女友,当她父母知道大熊父亲的历史后,坚决反对,说不能让他们的后代血管里流淌着纳粹的污血。在这种情况下,大熊通过“自我阉割”的方式来表达谢罪,洗雪耻辱。当吴嘉陵知道这一切之后,采取了与夏一红相反的做法,用宽恕、悲悯、爱与残酷真相之间达成和解。

《我的弗兰茨》中的语言表达也为人称道。《我的弗兰茨》体现了作者良好的语言驾驭力,小说多用“远取譬”的比喻手法,意象独特,想象力在文字中蔓延,令人过目不忘。比如:夏一红和“我”重逢时拥抱的动作,“像觅食的乌鸦发现了食物,展翅欲扑”;“我”提到天赐,夏一红的眼睛“像停电后的灯泡突然来电”;夏一红的手“握在手里像握着一把易碎的玉器”;夏一红的歇斯底里“像一把锋利的尖刀,划伤城市一角的安宁”;天赐出生的时候,“很丑很脏,让人联想到剥了皮的大老鼠”,小胳膊“已经举出了投降的姿势,仿佛已知命运多舛,人世不易,不如趁早投降算了”;“落叶在地上摊成一张黄金大饼”;“在紧闭的窗帘中间缝隙处,劈进来一道薄光,像一把寒光闪烁的大刀砍进房间”^[1]。诸如此类具有超常想象力、陌生化的妙句密集分布在小说中,大大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

参考文献

- [1] 海晓.我的弗兰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
- [2] 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22:71.
- [3] 田可新,师文静.《我的弗兰茨》在历史的延长线上重写海外新移民故事[N].大众日报.2023-12-20.

- [4] 利科. 记忆·历史·遗忘[M]. 李彦岑, 陈颖,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109 - 111.
- [5] 阿伦特, 等.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伦理的现代困境[M]. 孙传钊, 编.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0: 51.
- [6] 赖希. 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M]. 张峰,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0.
- [7] MANN T. Deutschland und die Deutschen 1938 — 1945[M]. Essays, Stockholm: Fischer, 1947.
- [8] 李文红, 王建斌. 德国人是如何反思二战的[J]. 和平与发展, 2015(5): 70 - 83.
- [9] 古大勇. 中外叙事文学中的“后母/继子乱伦”叙事: “乱伦”母题与中外叙事文学研究系列论文之一[J]. 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3): 110 - 114.
- [10] 刘再复. 性格组合论[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6: 57 - 89.
- [11]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他: 聂珍钊自选集[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4.
- [12] 彭小燕. 论“鲁迅世界”的三重意义体系[J]. 东岳论丛, 2020(7): 19 - 30.
- [13] 鲁迅. 鲁迅全集: 第五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328.
- [14] 鲁迅. 鲁迅全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254.

Savage War, Unique Characters, and Rich Connotation: On *Mein Franz* by Hai Rao

GU Dayong¹, CAI Li²

(1. Lu Xun College of Humanities, 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312000, China;

2. Library, 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312000, China)

Abstract: The celebrated Chinese contemporary writer Hai Rao, who is currently dwelling in Germany, has recently released her latest full-length Chinese novel “我的弗兰茨”(*Mein Franz* in German). This work explores the theme of World War II, as reminiscence of that era, which reveals the generational, persistent and procrastinating trauma of war. She denounces war and appeals for peace, after her reflection on World War II. Furthermore, the novel depicts Lady Bai Ge, a unique, vivid character with profound aesthetic value. The complex text encompasses multiple thematic elements of humanitarianism(culture), society (history), and metaphysical reflection.

Key words: Hai Rao; *Mein Franz*; war writing; character shaping; multiple thematic elements

〔责任编辑: 王建霞〕